

搜集奇緣

傅慧儀

搜集工作有若「尋寶遊戲」，每遇上可靠線索，便要竭力追查，游說片主同意捐贈或寄存電影拷貝，鼓勵電影公司送出文獻資料。尋寶過程中，自然不乏驚喜及新發現；每一段奇緣，皆其源有自……

本地奇緣之一：嘉禾遷址



嘉禾製片廠正門



嘉禾製片廠最後兩天，員工們都忙著收拾封箱。

十月三十日，斧山道嘉禾製片廠的最後兩天……

電影資料館蒙嘉禾公司的慷慨支持，得以在嘉禾搬遷後接收多部影片及電影文獻。這一天筆者隨同搜集組的同事來到現場收件，亦同時目睹片場即將要搬離的歷史時刻。

捨不得是那雙豎立了四十載的巨型鐵閘，上面鑄有昔日永華片場的「YH」字樣，在陽光映照下仍閃閃生輝；捨不得是那些製作了無數猛片的攝影棚，道具房及字幕室，這裏面不知流了多少人的血和汗；捨不得是那些已掛了二十載的李小龍原裝海報及成龍《警察故事》中用過的電單車。

看見永華的巨閘，不其然想起這片鑽石山地段的歷史。這次搬遷，在香港影史上又寫下了另一個章節，因為這片土地盛載了香港電影史的一大截，見證了近半個世紀的港片潮流進退。由五五年永華影業公司建影棚開始，再經過電懋公司（後易名國泰）的年代，才轉到嘉禾手中。嘉禾造就了如李小龍、成龍及許冠文等國際知名的巨星，為港產電影的一大支柱。與其合作製片的公司，計有威禾、寶禾、許氏等，皆以此片場為製作基地。

離別在即，員工們忙着收拾之餘，亦談論着翌日拍大合照的安排。紙皮箱一個個被搬上貨車，準備離去，部份紙皮箱則被送到資料館來.....

這次嘉禾交予資料館的影片合共二百多部，文獻資料包海報、劇照、電影雜誌等。

本地奇緣之二：冒死的珍藏



逃過戰火的電影《八百壯士》(1938)。

王文治先生是一名三十年代的電影愛好者，戰爭時期在上海開設「銀光沖晒店」，曾大力協助沖印當時的抗戰電影。一九三七年，王先生帶同家眷來港，也帶了自己沖印過的大部份電影拷貝。在港定居後，王先生重開沖晒店。到了一九四一年，戰爭蔓延至香港，王先生知道日軍暴行的影片一旦曝光，必難逃劫數，為掩耳目，便轉為經營生產熨斗和家庭用品，並把拷貝都埋在店中的地洞內。直至和平後，他才在舊店找回那批秘密的收藏品。

因着王文治先生對電影的熱愛，我們今天仍有機會看到三十年代攝製的《八百壯士》（1939）、《保家鄉》（1939）和《延安內貌》（1938）等影片。這些影片隨王家遷徙了十多次，逃過戰火的蹂躪，保存至今，實在十分珍貴。王先生於一九八六年病逝，上述影片乃經其女兒王泉珠女士安排，贈予香港電影資料館收藏。

本地奇緣之三：影星支持

最早願意捐出電影獎項的影人是影帝周潤發，他沒多考慮便把多年來所得過的獎座全數捐予資料館。隨後影后蕭芳芳亦慷慨地捐出她所有電影獎項。這些影人的支持不但豐富了館中藏品，更重要的是開拓了影藝界與資料館溝通的門扉，大大增加了圈中人對資料館的信心，對日後搜羅工作幫助極大。

本地奇緣之四：戲院關門

搜集工作往往要克服一重心理障礙，就是每逢影人逝世或影院結業，必須厚顏地與家屬及結業公司聯繫，這些都是搜集物料不能錯過的良機。

近兩年相繼結業的影院很多，例如皇都（九七年三月）、快樂（九七年九月）、聯華（九五年五月）、樂富（九八年八月）、元朗樂宮（九八年八月）及油麻地（九八年七月）等。在現場目睹着這些影院關門，不無唏噓之感。

海外奇緣之一：英倫遺孤



《人海孤鴻》（1960）中的吳楚帆（右）與李小龍（左）。

世事很奇怪，就有那麼一部香港名片，躺在英國蘭克沖印公司（Rank Film Laboratory）倉庫的架子上三十餘年，快被人完全忘掉之際，電影資料館職員訪英考察時，竟發現了這電影的彩色底片。此片不是別的，正是一九六〇年李小龍未成為功夫巨星前所拍下的《人海孤鴻》。原來早年一些公司，會將彩色影片運到外地沖印，於是某些菲林就這樣被「遺棄」在異鄉數十年。

這齣被尋回的《人海孤鴻》是彩色底片，並非我們常在電視看到的黑白版本，於是香港又有機會再欣賞到李晨風一九六〇年的首部彩色經典。

海外奇緣之二：三藩市



由世界戲院搜羅得的六百多部電影運返香港的情況。

越洋搜羅最具規模的一次收穫當數由美國三藩市華埠的世界戲院集回來的六百多部港片。九六年電影顧問及資料館職員聞悉世界戲院將改變經營方針，而其收藏於片庫的數百部港片拷貝亦再沒有放映用途。經搜集組多番聯繫與安排，六百多部收藏保養得頗佳的港片終得運返香港，其中包括多齣以為失傳了的經典名作，如《南海漁歌》（1950）《一板之隔》（1952）《兒女經》（1952）《慈母淚》（1953）等。

搜集組現正嘗試與其他美國華埠戲院聯繫，希望追查得更多港片於海外的下落。

海外奇緣之三：東南亞

透過走遍東南亞從事電影製作的人士，可追蹤到東南亞各地仍保存的港片資料，名製片及作家蔡瀾先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蔡瀾公親蔡文玄居於新加坡，多年來因工作關係集得邵氏公司一批珍貴的劇本，並非常有系統地結集釘裝成精裝本。現得其家人同意，把大部份收藏捐予香港電影資料館，這批劇本已從星洲運回，實屬難能可貴。

此外，本館高級經理廖昭薰走訪日本作交流時，在日本川喜多記念文化財團處發現兩部香港早期電影《小白菜》（1954）及《海棠紅》（1955）。在得到該文化財團的慷慨捐贈後，便安排拷貝運回資料館的手續，令館藏又多收兩部李麗華的名片。

搜集「補」存，任重道遠

搜集組主管唐詠詩經理在資料館工作兩年多，見證了不少搜羅香港電影的歷程，亦深深體會到工作崗位對保存香港文化的歷史意義。唐小姐為本刊提供了很多搜集的奇遇之餘，亦以訪問形式談了一些工作心得。

問：電影資料那麼多，除了電影拷貝之外，尚有文字資料、海報、劇照等，搜集起來該如何入手呢？

唐：資料搜集很多時靠一些線索，可能是影業界圈中人，亦可能是本地或海外的消息，經友人傳到資料館來。例如胡金銓的《忠烈圖》（1975），是依賴電影節節目策劃羅卡先生的朋友，透過早期的訪問，知悉該片的底片仍貯於香港的沖印公司。於是我們便開始四出查問，追查消息是否屬實。隨後得到當時尚未辭世的胡導演本人同意，便將該底片收藏到資料館。無論任何形式的資料，我們通常要接觸版權人，解釋資料館收藏影片的目的，獲得同意後再安排捐贈或寄存的手續。

問：搜集組面對的最大困難是甚麼？

唐：香港電影資料館起步較遲，數十年來失去了很多影片。相對其他國家，我們有很大的空白需要填補。香港跟其他一些國家不同，沒有立法規定所有本地出品的影片均要提交一套予資料館保存，所以我們往往要主動去接觸電影公司，解釋資料館的工作、片庫的設施等。要令片主對資料館有信心，認識到保存電影的重要性，還要走好一段路呢！

電影公司有時會誤解，以為影片一旦交了給資料館便不能再用或借回，其實無論「捐贈」或「寄存」方式，在不抵觸「保存」之原則下，他們們可惜回拷貝使用，版權始終歸片主所有。

問：搜集過程有沒有甚麼難忘的經歷？

唐：搜集工作像尋寶，觸覺要敏銳，遇到有利線索要鍥而不捨的追尋。尋寶的過程，往往有很多驚喜。印象較深刻的是一些慷慨的捐贈者，例如關漢泉先生把他先父關德興的物件大量捐出，現在成為資料館的密友。最近他在三藩市大明星戲院找到一批六十年代的戲橋，保存得很完好，都送了給資料館。還有收藏家鄭發明先生，往往願意自掏腰包買下一些珍貴劇照送予資料館。

還記得一位夏夢迷區詠儀小姐令我非常欽佩。她說非常喜歡她珍藏的物品，但希望更多人可與她一起分享這些東西，故此慷慨地捐出其藏品，這份推己及人的精神給了我們很大鼓舞。另外，一些電影機構亦非常支持資料館的工作，如銀都機構有限公司便很樂意授權資料館收藏他們擁有的版權的影片。此外，因工作關係，認識了一批年長的片主及電影工作者，這些老前輩都比較溫情，常常致電相約館的同事一起吃飯飲茶，這倒是搜集的額外收穫！

問：搜集組堪稱全館最前線的一個部門，令資料館的對外網絡不斷延伸，是否有任重道遠的感覺？

唐：搜集組的確是經常採取主動的部門，最初不習慣時，覺得處處碰壁，很多電影機構都會覺得我們很煩厭，因為無論捐贈或寄存，對他們的職員或多或少加添了行政工作；但日子久了，愈來愈覺得我們的工作是幫助片主，令珍貴的影片得以長遠保存，故此成功收得珍貴的影片，便覺得自己參與的工作很偉大，我認為徵集大行動的宣傳口號「補」存電影這個「補」字很貼切，亦是這份工作的意義所在。

我們親眼目睹很多影片拷貝因長期貯在潮濕、陰暗的角落，被遺忘多年而變壞變酸，甚至藥膜也剝落了。如果愈早能放到資料館來，便愈有機會讓這些影片獲適當的保存及修復。我們知道香港尚有很多影迷、市民或收藏家在家中藏得電影拷貝或各式電影資料，如果大家都作長遠一點的考慮，希望這些物品能永久保存，令更多人受惠，最理想的做法是捐贈或寄存於資料館。



搜集組的唐詠詩經理



搜集組是資料館最前線的部門，唐經理亦往往親自到影片公司統籌搜羅步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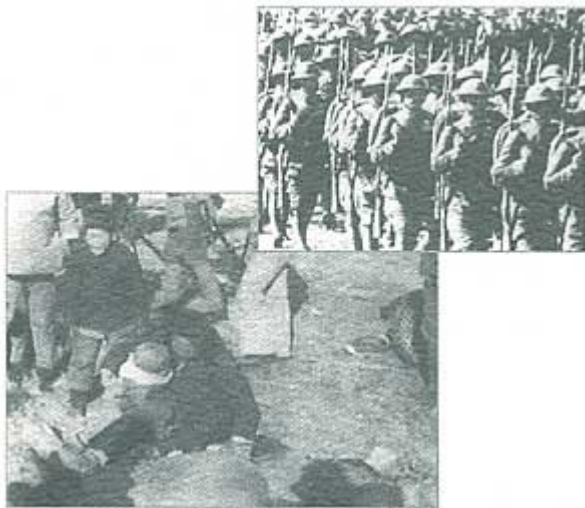


我們經常目睹很多影片因長期貯在潮濕的角落而變壞。

新增藏品



蔡瀾先生除捐出其父親收藏的大量劇本外，亦捐贈了很多有關電影的藏書給資料館。



安樂藝訊有限公司的江志文先生，捐出了他執導的幾部電影拷貝，其中包括七九年製作的紀錄片《慘痛的戰爭》，內有抗日戰爭及美日戰役珍貴片段。



關漢泉先生由三藩市帶回來大明星戲院六十年代的港產片戲橋，包羅了二百多部港片的資料及故事大綱。

評價《香港影片大全》第二卷



香港電影資料館出版了《香港影片大全》第二卷後，發出了問卷予電影顧問搜集意見，亦舉行了專家會議檢討第二卷的工作，及商議第三卷的資料搜集與編輯方向。

收回的問卷的《大全》反應極佳，其中：

舒琪先生表示：「全部十分滿意，請繼續努力。並（向工作人員）致最大敬意與感謝。」

吳昊先生認為摘錄部份參考價值極高，希望日後這方面的內容更詳盡，特別是第三卷涉及五十年代電影，資料將愈來愈多。圖片則只選最精采者便可。

陳國新先生對設計、內容及附註方面都給以很高評價，認為資料「非常完整、清楚」，設計、排版都「屬 A 級」，而資料館所作的努力並沒有白費。

資料館的研究組及編輯部參考了各方的意見後將更簡要地編寫第三卷，並盡量包羅更多影片於一冊之內，務求加快刊印五十年代的二千多部影片的資料。

「電」力與攝「影」的結合 —— 重究香港早期影史日誌

文：法蘭賓

譯：曾憲冠

編者按：

究竟香港最早出現電影放映活動是什麼年份？放映者是誰？所用的又是什麼樣的放映機？與發明家盧米埃派出的攝影隊有沒有關係？

上述問題多位電影研究者早前皆有研究，是次法蘭賓先生搜羅了不少英文報章的原始資料，承繼着早前一些研究者的分析，細緻推敲，抽絲剝繭，在得出一些新線索的同時，又再提出更多有趣的問號，端是研究香港早期電影面貌很值得一讀的文章。

香港電影之初

當電影放映機 Cinematograph 初到香港之時，有點像盜版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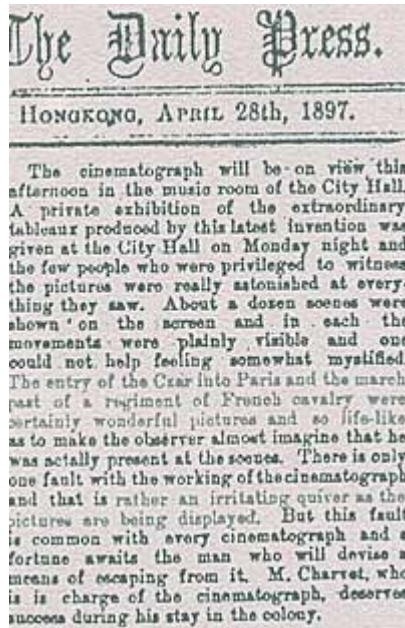
其實，Cinematograph[e] 跟「耐克」（Nike）或「新力」（Sony）一樣，是個品牌，屬法國的電影發明家盧米埃兄弟所有。從一八九六年起，盧米埃電影隊開始巡迴世界各地，推廣他們的新發明，並且到處拍攝電影，因此，最先將電影放映機帶到香港的理應是法國人。

而事實正是如此。

香港——巡迴首站

一八九七年四月二十三日，莫里斯·薩維特教授（Professor Maurice Charvet）——相信是巴黎人——乘坐「秘魯號」從三藩市抵港。報章報導他抵港的消息，對他攜來準備在大會堂放映一系列電影的放映機 Cinematograph 和電影鏡 Kinetoscope，深感興趣。這些機器是當時的科學創舉。據一八九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的《香港孖刺沙西報》稱：「該等機器從未見於香港，但港人對其利用屏幕，投放炫目的影畫，則早有所聞。」《德臣西報》一八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報導稱：「此等機器未嘗在香港或遠東地區出現。」

然而，不知怎樣的，電影鏡沒有了下文。四月二十六日，薩維特為新聞界舉行了一次放映會，只採用了 Cinematograph。放映的短片包括沙皇駕臨巴黎的場面、法國騎兵團巡遊，以及「世界各地光怪陸離的事事物物」。報章的報導，除了指「顛震頗覺滋擾」外，大都對攝影與電力的這種聯姻嘆為觀止，並且提到畫片「以每秒五十格之速度在鏡頭下跳動」，栩栩如生。



一八九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的《香港孖刺沙西報》提及薩維特教授展示的放映機，曾放映的影像包括沙皇駕臨巴黎及法國兵團的步操實況，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顛震頗覺滋擾」。

可惜，翌日的正式放映取消了。薩維特宣佈：「鑒於機械之精密、安裝之複雜，加上要配合先進的電力裝置，完善之調校與操控乃不可或缺，薩維特教授茲決定放映延期一天開幕。」換言之，機器發生了故障。

幸而放映會終於在四月二十八日星期三早上順利舉行，節目長達一小時，每天放映五場，至少持續至五月四日。畫面依然跳躍不定，但來捧場的觀眾卻源源不絕，根據《京津時報》一八九七年五月十四日的報導，Cinematograph在大會堂的聖安德魯廳展出，每天皆吸引大批觀眾前往參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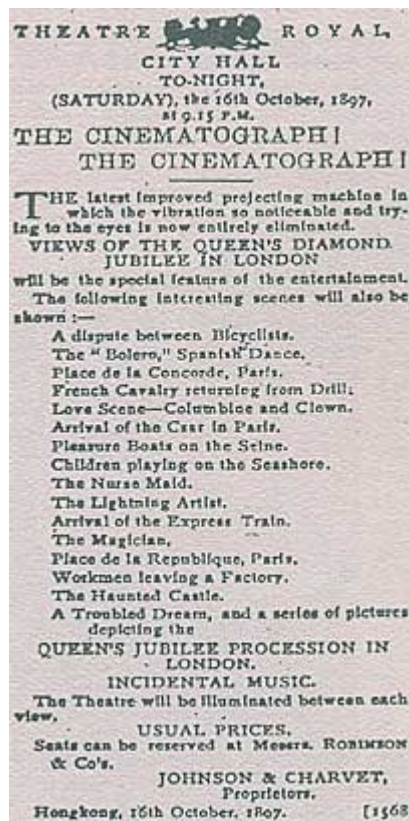
香港是薩維特巡迴世界的第一站，是年六月，他前往上海，準備在中國展出該放映機。

一年之內五場放映

八月二十一日，薩維特的對手在大會堂皇家劇院展出了動畫放映機 Animatoscope。此乃愛迪生當年的新發明，較早時才特別為在英國駐北京公使科羅德·麥當奴爵士展示過。事實上，七月二十四日的《京津時報》也拿動畫放映機 Animatoscope 與 Cinematograph 作比較，認為前者勝過後者；Animatoscope 的「三十至四十萬張畫片.....投放速度每秒達四十八格，畫面遂覺順滑流暢。」

十月十六日，薩維特及其夥伴莊臣教授重臨香港。這次，他們帶來了十七部短片，在皇家劇院放映，短片內容包括維多利亞女皇倫敦銀禧巡遊、一齣題為《單車手的爭執》的喜劇、協和廣場及塞納河等巴黎景色、引人入勝的《幽靈古堡》，以及各種各樣的題材，儼然一個盧米埃作品展。可惜影像有時搖搖晃晃，有的更「模糊

不清，未如理想」。



《香港電訊報》於一八九七年十月十六日所刊廣告，提及薩維特教授與夥伴莊臣教授重臨香港放映，節目包括《單車手的爭執》、巴黎協和廣場及塞納河、工廠女工及《幽靈古堡》等。

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三日，Animatoscope 捲土重來，這回的主辦機構卻是納夫德里兄弟公司，放映地點在皇后大道東軍器廠街五號。

一八九八年四月二日，魔術師卡爾·赫茲假皇家劇院演出，其間展示了一款 Cinematographe，並連同大量片目（約二百個項目）。赫茲指出：「諸君倘無緣一見正宗、神奇、晚近瘋魔西方之 Cinematographe，可謂落伍矣。」短劇和喜劇像《納爾遜之死》《寡婦之吻》以及《噩夢》等，令香港觀眾為之絕倒。一位記者吹捧說，這部機器「較之先前所見者，遠為優勝」，但也有另一位記者不同意，認為「不及先前在此間陳示的『窺視鏡』（Squintograph）」。赫茲的演出至少持續到四月十六日。

於香港電影放映而言，真是忙個不亦樂乎——一年達五個影展之多呢！

盜版電影與地下放映

以上臚列的事實，都是來自當年香港（註1）或中國大陸的英文報紙，再加上其他一些新近發現的材料，為香港早期電影放映的日誌提供了新的資料。然而，這些新發現，又引申另一些問題。

薩維特的電影放映機，是否正如《德臣西報》所述，是第一在香港甚至遠東地

區進行放映活動的同類型機器？

一八九七年五月二十八日的上海的《北華捷報》印證了這個說法。該報評論了五月二十二日在上海阿斯特禮堂舉行的 Animatoscope 放映會，指「此等神妙機器早以多種名目風行，而今首次於上海目睹」，又說「較幻燈之先進，不可以道里計」。同年九月十日，該報稱薩維特的 Cinematograph 對上海人來說「頗為新穎」，又謂「如許既摩登又靈巧之照相術，此前曾一度展示而已」（指上述五月二十二日之放映）。

然而，法國里昂的盧米埃學院卻有不同的說法，謂「盧米埃公司」於一八九六年八月十一日在上海徐園舉辦了放映會。對此，好些中國電影史著作中都有充份記載，儘管不夠明確，而且並無提及「盧米埃」的名字。資料應源自刊登於上海《申報》的兩則廣告。

盧米埃學院的法比里斯·卡塞冬尼表示：「Cinematograph 的使用權，肯定屬於盧米埃，但卻無從保護。據估計，一八九六年，單在法國便有超過六百部仿製品一下子面世或取得專利權。因此，未經授權而以 Cinematographe 之名進行的放映活動，不難於一年之後在香港出現。……至於莫里斯·薩維特其人，我們並無紀錄。」

作家格利夫·索里（註二）指出，一八九六年，盧米埃氏拒絕授權卡爾·赫茲在他的演出中使用 Cinematographe，赫茲從發明家羅拔·保羅那裏取得一部放映機，並在其演出中將之標榜為 Cinematographe。

那麼，薩維特和赫茲算不算藐視當時的商標法？而那部從一八九七年五月十二日起成功在新加坡放映過一整季、名稱可疑的「巨型 Cinematograph — 里普放映機」（Ripograph）又是甚麼一回事？

也許，在香港和中國大陸還有其他非公開的活動。既然盧米埃的放映機一八九六年出現於倫敦，盜版的 Cinematograph 同年也可以香港為首站，出現於中國，而帶貨人可能不願太張揚，正如現在那些錄像帶、鐳射碟或數碼光碟的翻版商一樣。

聆訊告一段落。

註一：《德臣西報》、《香港孖刺沙西報》以及《香港電訊報》。

註二：參看索里氏 "The Illusionist and the Cinematograph" 一文，刊於 The Big Picture，第 11 期，九七年夏季。

香港最早的電影放映活動

日期：	機器名稱：	地點：	評論摘要：
一八九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時起（至少持續至五月四日）	莫里斯·薩維特教授的電影放映機 Cinematograph	大會堂聖安德魯堂	「……不同凡響」、「栩栩如生……以每秒五十格的速度運行……期間之顛震頗覺滋擾」。 （《香港孖刺沙西報》一八九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一八九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星期六）起（至少持續至八月二十八日）	韋比—古格（H Wellby-Cooke）的動畫放映機 Animatoscope（愛迪生的新發明）	大會堂皇家劇院	一位曾參與大陸較早前所舉行的影展的評論家認為，Animatoscope 影像清晰得多，總體而言較 Cinematograph 優越。一八九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京津時報》的評論稱，Animatoscope 的秒速為四十八格。
一八九七年十月十六日（星期六）起（至少持續至十月二十日）	莊臣教授與莫里斯·薩維特教授的 Cinematograph	大會堂皇家劇院	屬「最新型」，「擾人之顛震幾近於無」，但仍有若干畫面「模糊不清」。 （《德臣西報》一八九七年十月十八日）
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星期日）起	Animatoscope 捲土重來	皇后大道東軍器廠街五號	
一八九八年四月二日（星期六）起（至少持續至四月十六日）	倫敦魔術師卡爾·赫茲的 Cinematographe，似為羅拔·保羅發明的「戲劇放映機」（Theatrograph）	大會堂皇家劇院	畫面「無不清晰逼真」，「Cinematograph 較之先前所見者，遠為優勝」。 （《香港電訊報》一八九八年四月四日）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二）起（至少持續至十二月三十日）	電影鏡 Kinematoscope 出現於舞台表演環節《木琴與電影鏡》之中	大會堂聖安德魯堂	「無與倫比……影片趣味盎然。」 （《香港孖刺沙西報》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註：引用報章內容以英文為準

法蘭賓先生是來自墨爾本作家，目前正與香港電影研究者羅卡先生合作，為美國 SCARECROW 出版社撰寫《香港電影——跨文化的視野》一書。